



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

赵逵夫 /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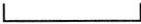
秦史求知录

(下)

祝中熹 /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


赵逵夫 / 主编

秦史求知录

(下)

祝中熹 /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丙编 都邑・地域

秦人早期都邑考

关于秦民族的起源问题,近代以来论者颇众。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意见:一说秦人原系东方夷族,夏商间或商周间西迁至关陇地区;一说秦人本即西方戎狄,最早活动于今甘肃天水一带,后渐东进关中。为篇幅所限,本文不拟牵涉此项论争,只就古史有明确记载的秦人在我国西部发展史上的早期都邑,作一番较深入的辨析,以求澄清诸多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。好在不论秦族源于东方还是西方,大家都承认秦族有这么一段以甘肃东部为活动中心的历史。

一、纷杂的歧说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对秦人在西方的崛起,有很详明的记载。宪公以后的都邑^①,地望明确,古今学者均无异议,问题在于文公以前。《秦本纪》述文公以前秦人的都邑,首言“西垂”,曰商王朝后期,秦先祖中湣“在西戎,保西垂”。这个“西垂”,是泛指西部边陲呢,还是一具体城邑?历来存在争论,下文将详辨之。次言“犬丘”,曰中湣后代有大骆一支,“居犬丘”。此“犬丘”,有关中槐里(今陕西兴平)及天水西南境二说,其是与非也容后论。再言“秦”,曰大骆之庶子非子,为周王室牧马有功,而被“分土为附庸,邑之秦”。此“秦”究为何地,众说纷纭,认识最为混乱。此外还有个“汧渭之会”,曰文公三年率部

^① 宪公,《史记·秦本纪》作宁公,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亦作宁公,误。据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村出土的秦公钟、罍的铭文所列世系,当为宪公。《秦始皇本纪》文末所附《秦记》即为宪公不误。

东猎,次年“至汧渭之会”,“乃卜居之”。这个“汧渭之会”,亦即《帝王世纪》所言文公徙居之“汧”,因其位处汧、渭二水的交汇地带,故地望是清楚的;但它与非子所封之“秦”是否为一地?也还有辨明的必要。

王国维曾撰《秦都邑考》^①,首次对以上《秦本纪》所言四地作了简要清理。他指出:西垂、犬丘、秦,皆在陇坂之西;而且,这三处都邑,分别与西周、春秋、战国三个历史时期相当。王氏的论述过于简略,未言具体地望,且显然有含混之处。如他既“疑犬丘、西垂本一地”,又将西垂、犬丘与秦分列三处。其尤误者,是将上述三处秦邑与三个时期对应,掩盖了秦人在关陇地区发展经历中跌宕起伏的复杂性。后世学者认识不同,所言各异。徐中舒先生认为位处今陕西兴平之犬丘,与位处今天水市西南境之犬丘,秦人都曾居住过(地名随部族而迁);而天水西南之犬丘称西犬丘,又称西垂,也即《史记集解》引徐广所说之秦亭^②。高亨先生则认为非子所封之秦,即今天水市的故秦城;秦庄公所居之犬丘,即今陕西兴平县东南的槐里城;至襄公迁汧,即今陕西陇县之汧城;文公迁郿,即今陕西郿县东北的故郿城^③。林剑鸣先生说非子以前秦人所居之犬丘,即汉代的槐里(今陕西兴平);而西犬丘也就是非子所邑之秦,即汉代陇西县之秦亭;所谓“西垂”,乃泛指西部边陲,非具体城邑^④。段连勤先生则肯定中涵至非子八世皆在犬丘,也即西垂,地处今天水之西南方;而非子所邑之秦,处今甘肃清水县境内^⑤。近几年的一些古史著作涉及此问题时,常笼统地言秦早期都邑为今甘肃天水或天水一带。如《剑桥秦汉史》^⑥即谓非子的“后裔得到了公的称号。这个称为秦的附庸,位于今甘肃的天水”,而“后来,几次迁都使秦越来越东移”。陈守忠《河陇史

① 《观堂集林》卷12。

② 《先秦史论稿》,巴蜀书社,1992年,第207页。

③ 《诗经今注·诗经简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,第8~9页。

④ 林剑鸣《秦史稿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年。

⑤ 《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、族属问题》,载1982年《人文杂志·先秦史集刊》。

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2年。

地考述·甘肃的石窟艺术》^①也说“天水为秦国的发祥地”，麦积山一带，“可能就是秦非子给周王牧马的地方”。

如果我们翻一翻甘肃东部地区的地方志，不难发现，关于秦都邑的叙述更是歧说层出，令人眼花缭乱。集中反映了方志异说的是1992年出版的《甘肃的由来》^②一书。其中，《天水古今名称趣谈》一文，说周孝王“给养马有功的非子封了秦亭这块地方（今张家川、清水一带），号作秦嬴”，又说秦亭、西垂为一地，即“天水一带”。《关陇重镇——秦城》一文，说西周时“在秦城区西南建立了先秦嬴非子城邑，也就是被史学家称为先秦国都的犬丘”。《史话张家川》说非子所封之秦亭，“据考即今张家川镇城南附近”，“今天的张家川秦时叫做‘秦川’”。《漫谈清水》说“清水是秦的发祥地”，非子封地秦亭“在今清水县东45里，俗名秦（亭）子铺，近有亭乐山”。《说嘉道潭话礼县》则称“礼县是秦的发祥地”，“秦都邑西垂（西犬丘），其故址在今礼县红河乡”，礼县古名“天嘉”，是秦人“对其发祥地的美称”。《西和县与仇池山》则云史籍中的西犬丘，即西和县“今上城纱帽咀”，正因为西和是“秦的发祥地之一”，故以“西”字冠县名之首。

说法如此歧异，教人何适何从？看来的确有必要在当年王国维所作研究的基础上，对秦人早期都邑进行一番认真求实的辨析工作了。

二、西垂与犬丘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云秦之先祖中湫“在西戎，保西垂”，又述申侯对周孝王说的话：“昔我先邠山之女，为戎胥轩妻，生中湫，以亲故归周，保西垂，西垂以其故和睦。”仅以此两处之西垂言，确难排除其泛指西部边陲的可能性。然而《史记》另外还有多处关于西垂的记载：《秦始皇本纪》说：“至周之衰，秦人兴邑于西垂。”《封禅书》说：“秦襄公

① 兰州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。

② 甘肃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。

既侯，居西垂。”《秦本纪》说秦庄公打败了西戎之后，号称“西垂大夫”，又说“文公元年，居西垂宫”。这几处所言之西垂，已很难再视为方位泛指。周代言大夫，如冠以地名的话，一般均为具体城邑，罕有泛言地域方位之例。我们从《竹书纪年》、《世本》等先秦史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，上古史笔虽略，但极重视部族活动之中心居邑（这与当时部族迁徙频繁有关），记载某王某君登位，必言其“居”于何处。可以有阙载，但凡史文言及者，均系具体城邑，决无泛指。秦焚六国史书，独存《秦记》，司马迁写秦史，有《秦记》可依（关于此，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言之甚明），故较他国历史详确。其《秦始皇本纪》篇末附录中，对秦之历代君主按在位顺序作了扼要介绍。春秋时期共列十七公，言居于何处者十一公：文公居西垂宫，宪公居西新邑，出子居西陵，武公居平阳封宫，德公居雍大郑宫，宣公居阳宫，成公居雍之宫，康公居雍高寝，共公居雍高寝，桓公居雍太寝，景公居雍高寝。我们从中可以看出，国君“居”于何处是具体而明确的。西垂之外的所有居地皆为城邑名，西垂自不当例外；而且，西垂既与“宫”组合成词，必为具体地点无疑。此外，《史记》还明言襄、文二公死后“葬西垂”。和言“居”地一样，古史言葬地一般也不泛指。前述《秦始皇本纪》篇末附录所列春秋时期秦之十七位国君，皆言葬地，除襄、文二公葬西垂外，余十五处葬地之地望皆具体可考。西垂之表义不当性质有别，不应独为泛指。

古代学者也大都认为西垂乃城邑名。《史记集解》引《括地志》云西垂：“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，汉陇西西县是也。”《史记正义》亦认为西垂即汉之西县。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早有此说。酈道元注《水经·漾水》亦持此说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陇西郡属县中确有西县，新莽时改名曰“西治”，东汉时又复称“西”，改属汉阳郡。但“西”作为城邑名，并不自汉代始，战国时期即已有西县之建置。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秦墓的“陇西郡戈”（据考为秦昭王二十六年造），即有“西工宰闾”的署铭^①。出土于甘肃礼县的战国秦右库工师铸戈，铭文中亦署

^① 见刘占成《“陇西郡戈”考》，载《考古与文物》1994年第4期。

“西工造”^①。再往前追溯,1919年发现于天水西南乡之著名的秦公簋,在原器铭之外,又有秦汉间凿字“西元器一斗七升八奉”。王国维《秦公敦跋》释曰:“西者,汉陇西县名,即《史记·秦本纪》之西垂及西犬丘。秦自非子至文公,陵庙皆在西垂。此敦之作,虽在徙雍以后,然实以奉西垂陵庙,直至秦汉犹为西县官物,乃凿款于其上。”^②王氏所说甚是。“西元器”者,西邑原存之器。此簋(王国维时代尚称簋为敦)人们公认为春秋中期器,由此可知“西”之地名由来已久。李学勤先生在《释〈不其簋铭〉》一文中,也认为“西是具体地名”,即古时叫作西垂的地方,也即秦汉时代陇西郡之西县。《尚书·尧典》载尧任命掌四方也兼掌四时之官:“分命羲仲,宅嵎夷,曰暘谷,寅宾出日。”“分命和仲,宅西,曰昧谷,寅饯纳日。”是时盛行日崇拜,对于太阳的出现和消失,部落联盟权力机构中有专职人员负责举行迎送仪式。羲仲执掌迎日典礼,居于称作暘谷的嵎夷;和仲执掌送日典礼,居于称作昧谷的西。暘与昧,分指日出、日落之象;嵎夷和西,则显然是具体地名。《禹贡》:“青州:嵎夷既略,莱夷作牧。”已指明嵎夷乃山东半岛之一处。西,《史记集解》引郑玄曰:“西者,陇西之西,今人谓之兑山。”“兑”字实为“八充”二字合一之讹。“八充”者,“蟠冢”也,音近而通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汉阳郡西县条下,注引郑玄此语,正作“八充山”,即位于今甘肃礼县东北、天水县境内的蟠冢山(今名齐寿山)。当然,《尧典》的写作时代颇有争议,但它成篇于战国以前,则为多数学者所承认。总之,“西”作为具体地名,从先秦至魏晋,保持了其一贯性,我们不能视之为方位性泛指。“西”实即商周时代“西垂”的简称,而且,只有在“西垂”为一定点地名的情况下,才会出现这类名称的演化。假如“西垂”泛指西部边陲,则“西”字纯系指示方位的词素,地名的简化重心就不可能落在它头上,也就是说,不可能以它来名邑、名县。西垂既为具体地名,则《秦本纪》所言中湣“在西戎,保西垂”之“保”,实即郑玄所谓“小城曰保”之保。全句意为在西垂地区建立了部族城邦。《穆天子传》言穆王“至于瓜瓠之山,三周若城,阨

① 该戈现藏甘肃省礼县博物馆。

② 《观堂集林》卷18。

氏、胡氏之所保”。“保”字亦城堡之义。西北地区多山，古代居民多在山坡向阳面台地上筑堡以自固。此种习俗，直到民国年间犹存。

确定“西垂”乃具体地名之后，西垂与犬丘的关系就变得明晰了。中湫居西垂，与周民族保持了和睦的关系。其子蜚廉、其孙恶来虽均因事纣而与商王朝俱亡，但中湫的另一支后裔大骆族，却继续在西垂地区生活下来。史称大骆“居犬丘”，而未言其由西垂迁犬丘，从逻辑上说，犬丘与西垂应为一地。因此，当后来犬丘被西戎占领，秦庄公把犬丘从戎人手中夺回来时，他便拥有了“西垂大夫”的称号。

西垂、犬丘本为一地的最有力的证据是：二名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。这里我们不得不稍涉秦人的族源问题。秦人来自东方说极其重要的一条论据便是：春秋时东方也有一地名犬丘，昔日秦人西迁时将此地名带到了关陇地区。而且，东方的犬丘还有一个名字即叫“垂”。《春秋·隐公八年》：“春，宋公、卫侯遇于垂。”《左传》解释此事曰：“八年春，齐侯将平宋、卫，有会期。宋公以币请于卫，请先相见。卫侯许之，故遇于犬丘。”杜注：“犬丘，垂也。地有两名。”《水经·瓠子河注》：“瓠渚又东径垂亭北。《春秋·隐公八年》宋公、卫侯遇于犬丘，经书垂也。京相璠曰：今济阴句阳县小成阳东五里，有故垂亭者也。”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济阴郡下云：“句阳有垂亭。”《春秋·桓公元年》：“三月，公会郑伯于垂。”顾栋高《春秋大事表》释曰：“垂，《左传》作犬邱，一地两名。济阴句阳县东北有垂亭。今山东曹州府曹县北三十里句阳店，是其地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沛郡有敬丘县，注引应劭曰：“《春秋》‘遇于犬丘’。明帝更名大丘。”汉时已认为“犬”字不雅，故明帝改犬为大；后来又称“敬丘”，是为了隐含与原地名的关系：犬即狗，狗与敬古音相同。此外，《左传·襄公元年》亦言及此地：“郑子然侵宋，取犬丘。”这个位处东方而又叫作“垂”的犬丘，在古代是很有名的，《易林》中即多次使用过这样一则卦辞：“车驰人趋，卷甲相仇。齐鲁寇战，败于犬丘。”《中国历史地图集（一）》将此犬丘标在今山东省曹县境内，并以括号注一“垂”字。《左传》成书远在《史记》之前，犬丘与垂一地二名是早已存在的事实。上古时代部族迁徙十分频繁，地名随族而迁的现象相当普遍。段连勤先生认为秦族本是东方九夷中的畎夷，故其所居之垂地亦称犬丘。秦人西迁后，西方也

便有了垂与犬丘一地二名的对应,而加“西”以示其方位,曰西垂,曰西犬丘^①。据此,则“西”字最初确实是个方位词,但组成“西垂”地名后,专称历久,表义便固定化,因此后世即以“西”字名该邑。

这里还有个槐里(今陕西兴平)亦曾称犬丘的问题。《水经·渭水注》言槐里,曰:“古犬丘邑也”,“秦以为废丘”。《史记集解》引徐广,即认为非子所居之犬丘乃“今槐里也”。《史记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也说:“犬丘故城一名槐里,亦曰废丘,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。”徐广及《括地志》依据的是《汉书·地理志》:“槐里:周曰犬丘,懿王都之。秦更名废丘。高祖三年更名。”我要指出:《汉志》虽云槐里曾名犬丘,但并未说它就是非子所居之犬丘。关中槐里之所以有犬丘之称,可能是当初秦人西迁时,曾在那里居住过。后来秦人继续西移,越陇而至甘肃东部,甘东成为秦人长期经营发展的地区,其中心城邑遂名西垂或西犬丘。而关中之犬丘便被称之为“废丘”。此邑周懿王曾一度迁居之,是时秦人早已西迁至甘肃。否则,懿王与大骆为同时期人,那时周、秦关系甚好,犬丘既为大骆之都邑,懿王何以能都之?因此,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只言“懿王迁都废丘”而不言犬丘。《今本竹书纪年》则直接言懿王迁槐里。《集古遗文》收有秦废丘鼎,《十钟山房印举》载有秦废丘左尉印,皆为秦有废丘地名之确证。秦称关中槐里为废丘,此邑与“西”毫无牵连,决非又名西垂的那个秦人祖地犬丘。

三、西垂地望

既然西垂与犬丘为一地,且即古籍多言之“西”,也即秦汉时代之“西县”,那么,只要我们能够确定西县之所在,也便解决了西垂的地望问题。

西县的位置,《括地志》说在“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”,《史记正义》同此说。《甘肃通志》、《直隶秦州新志》、《天水县志》等,皆言汉

^① 《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、族属问题》,载 1982 年《人文杂志·先秦史集刊》。

西县在天水“西南一百二十里”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、王国维《秦公敦跋》，以及今人马非百的《秦集史》、刘琳的《华阳国志校注》，均采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之说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西，《禹贡》嶓冢山，西汉所出，南入广汉白水，东南至江州入江。过郡四，行二千七百六十里。莽曰西治。”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：“西，故属陇西。有嶓冢山，西汉水。”《史记·五帝本纪索隐》：“嶓冢山在陇西西县，汉水所出也。”这样，我们确定西县故城的位置便不仅有方位、距离可参，又有山、水可依。嶓冢山，即位于今甘肃省天水县中南部的齐寿山。至于西汉水，欲辨明须多费点笔墨。

《禹贡》所言“嶓冢导漾，东流为汉”的漾水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为养水），即今纵贯甘肃省徽县东部的永宁河上游，它源于嶓冢山的东麓；而西汉水之上游今盐关河，源于嶓冢山的西麓。嶓冢山为此二水的分水岭。今此二水皆流入嘉陵江，南入四川。上游为盐关河的这条水与汉水毫无关系，为什么一直被称作“西汉水”呢？原来，先秦时的嘉陵江并不入川，而是直接与汉水上游相通，至今尚能窥其古河道之留存^①。古地理书多言西汉水自葭萌入汉，古葭萌位处今陕西省阳平关附近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曰：“葭萌城在保宁府广元县西北，古苴国也。”《华阳国志》：“昔蜀王封其弟葭萌于汉中，号曰苴侯，命之邑曰葭萌。”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说：“嶓冢之山，汉水出焉，而东南流注于沔。”此“沔”，即今汉水之上游勉水。嘉陵江曾与汉水通流，而嘉陵江上游又是由同源于嶓冢山的两条水构成，故前、后《汉书》皆有东、西二汉水之说。《水经注》综括诸书而肯定“东西两川，俱出嶓冢，而同为汉水者也”是正确的，其引《汉中记》所言“嶓冢以东，水皆东流；嶓冢以西，水皆西流”，正是天水南部山川形势的实况。《水经注》言及西汉水常直谓之汉水，表明是时该水与汉水的通流关系尚未完全切断。后人因嘉陵南流入川，而汉水只汇汉中西部之水脉，便傅会《禹贡》而名今陕西宁强北部之山为嶓冢。后魏正始中，析沔阳置嶓冢县，属华阳郡；隋大业初又改置西县。这样，便在汉中西部的沔阳

^① 参看李健超《我国第一条电气化路线——阳安铁路》，载《地理知识》1978年第7期。

地区,将嵕冢与西县联在了一起。故《隋书·地理志》汉川郡有西县,云“旧曰嵕冢”,境内有嵕冢山。于是便有了两座嵕冢,两个西县,两条漾水,两个汉源。其实,南北朝以前,只有位于今天水南部的那座嵕冢山,西汉水即源于此山之西麓,上游即今出天水县经罗家堡入礼县境的盐关河。而与此西汉水相关联的西县,才是真正的秦汉时代的西县。

《水经·漾水注》:“西汉水又西南,合阳廉川。水出西谷,众川泻流,合成一川,东南流,经西县故城北。秦庄公伐西戎破之,周宣王与其大略大丘之地,为西垂大夫,亦西垂官也。王莽之西治矣。”大略即大骆,大丘乃犬丘之误写。酈氏这段话不仅明言西县、犬丘、西垂同为一地,而且指出西汉水支流阳廉川流经“西县故城北”。这条杨廉川,据酈氏说,本应为“杨广川”。东汉初割据天水地区的隗嚣,战败后率妻子奔西城,从其部将杨广。后杨广即死于该城,俗即以杨广之名名其川。广、廉二字形似,故后人遂讹为杨廉川,北魏时即在该地置杨廉县。杨廉川今名峁水河,流经礼县、天水交界地区的礼县一侧,东南流入盐关河。有名的礼县红河水库,即位于该河经域之中部。老友康世荣君主编礼县县志时,曾撰《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》一文^①,即据《水经注》此段记载而定西垂故址为今礼县红河乡岳家庄。康君所证地望,与《中国历史地图集(一)》所标方位相符(大体在今天水市与礼县县城联线的中点上)。当年王国维也曾说过:“使西垂而系地名,则酈说无以易矣。”^②

然而,酈氏关于西汉水流域的记述虽极详备,却有两处十分明显的矛盾:1. 上文既言“杨廉川东南流径西县故城北”,下文却又说汇纳杨廉川之后的西汉水,“又西南径始昌峡,始昌县故城西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:‘天水始昌县,故西城也。’”《寰宇记》亦言始昌城即汉代的西县城,晋省西县而置始昌。《后汉书·隗嚣传》李贤注:“西,县名,属汉阳郡。一名始昌。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。”显然,始昌即西县。那么,其故城究竟位处杨廉川经域呢,还是位处西汉水主流经域?

① 刊于《礼县史志资料》第七期,1986年12月,油印稿。

② 《观堂集林》卷12。

2. 酈氏介绍水道汇人之支流,是沿水流方向按汇入之先后顺序叙述的,记西汉水也不例外。但注文述西汉水汇入盐官水及左谷水之后,却先介绍建安水,后介绍祁山。建安水即今甘肃省西和县北部之西和河,它由南而北,在今礼县永兴镇西侧入西汉水。而祁山在永兴镇以东十余里处。西汉水此段走向大体是由东而西,须先经祁山脚下,再西流十里后,方与由南而来的建安水也即今西和河相汇。这两处矛盾告诉我们,对西汉水流域中的这一段落,酈氏把握得并不十分准确。还须指出:酈氏说杨廉川本应为杨广川,因字形相近而错讹。我怀疑这纯系他个人的臆测。地名首先是赖音而存的,其生命力在于当地群众的习用;字形可以相讹,而实称却不会随之音变。此外,杨广是以中央王朝的叛将身份而传名后世的,正史别记均不曾言其有过德政善举,西县民众设有理由以其名命名一条河流以示纪念。把杨廉川说成杨广川,从而把与杨广有过联系的西城,从西汉水经域移到了杨廉川经域,是酈道元的一个错误。

秦汉至魏晋,由于位处蜀陇要道,西汉水上游曾经是颇被关注的地带,许多重要战事发生在这一区域。我们不妨对正史中涉及这一区域的记载作些分析,将所获得的若干孤立的但却是明确的判断综合起来加以考察。这样可能有助于西县地望的澄清。

《史记·周勃世家》述勃之武功,言其“围章邯废丘,破西丞,击盗巴军,破之,攻上邽”。“废丘”问题此处姑勿论。“西丞”,《正义》认为即“西县丞”,徐广曰:“天水有西县。”秦制“丞”为县令、长之副手,掌管军事。“破西丞”与“击盗巴军”连述,西县位置当在陇南范围内。《史记·樊哙传》言哙“入汉中,还定三秦。别击西丞白水北。”《索隐》:“案:西谓陇西之西县。白水,水名,出武都,经西县东南流。言哙击西县之丞在白水之北耳。”这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:西县位置在武都的“白水北”。白水者,今日之白龙江是也;“经西县东南流”,可以理解为白水流域接近西县境。据此,则西县县治决不会远涉杨廉川流域。

《后汉书·段颖传》言颖讨伐东羌,首战于安定高平,又败羌于灵武谷,羌众“散入汉阳山谷间”,在凡亭山一带经历了一番激战,“羌众溃,东奔,复聚射虎谷,分兵守诸谷上下门”。为了彻底击败羌众,颖

“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”，并占领东、西两面山峰，以遮羌众散逃之路。凡亭山即瓦亭山，位处今秦安葫芦河上游，射虎谷位处今天水县中南部。当时陇南为羌族活动频繁地区，故羌众败逃方向大致是由西北而东南。以此观之，西县当在射虎谷之南，而不会在其西，如今日礼县之红河乡。

《三国志》载诸葛亮伐魏，建兴六年初出祁山，前锋马谡丢失关陇咽喉要冲街亭，诸葛亮不得不撤兵还蜀。归途中“拔西县千余家”。马谡战败时，诸葛亮在祁山附近，大军实经今之西和、成县而还归汉中。如此则西县故城不可能远处西北方位数十里之外的杨廉川中游，而必在由祁山返汉中的路线上。诸葛亮这次北伐虽然失利，却意外地收降了后来成为蜀军主将的姜维。姜维本是魏天水郡武官，诸葛亮攻祁山时，他正与郡之属官陪同太守至各地巡行。蜀军至祁山，诸县响应。太守怀疑姜维等有异心，遂“夜亡保上邽”。维等追随后，而太守闭门不纳，维等不得已，反归郡治冀（今甘谷县城东十里之六峰镇）。据《姜维传》裴注所引《魏略》言，冀城吏民推举维等去与诸葛亮联系，“亮见，大悦”。但适逢马谡战败街亭，军事形势急转直下，诸葛亮“遂将维等却缩”。姜维来不及归冀迎会城中降者及家属，仓猝间随亮入蜀，以至于母亲、妻子被魏军所虏。显然，街亭战役后诸葛亮立即收缩兵力，决策南返。冀城在祁山之西北，如按《水经注》第一种说法，西县故城位处杨廉川中游的话，那正是祁山至冀城的中间点。此时的诸葛亮不可能为了攻拔西县而向西北方深入，那恰与其向汉中撤退的方向相反。果真诸葛亮西北进军，那正是姜维归冀与家人相聚的机会，史文也不可能称亮“遂将维等却缩”。又，建兴九年，诸葛亮再次由陇南北伐，分兵留攻祁山，自率大军北上，与司马懿“遇于上邽之东”。终因粮尽退兵，经卤城（今礼县盐官）而回祁山。魏大将张郃追至木门（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言木门谷在秦州西南九十里。今盐官与天水县小天水之间），被蜀之伏兵射死。综观诸葛亮前后两次出祁山的战事，其行军路线是很清楚的，即从阳平出发，沿西和峡北上，围祁山，据卤城，经平南一带直趋天水而渡渭。目标是由街亭越陇坻而进关中，并不曾沿杨廉川西北进军，绕一个大弯子后再渡渭越陇；失利后退兵南归时，更不会作此愚拙的绕行。因此，位处蜀军

南退路线上的西县，必不在杨廉川经域中。

让我们再来看《三国志》所载另一段史事。《魏书·杨阜传》言马超攻占冀城，违约杀害了凉州刺史韦康。别驾杨阜虽降超而“内有报超之志”，等待着起事的时机。正巧，阜妻死于西县，而阜之妻兄姜叙正屯兵于历城。杨阜便以经营妻丧为名向马超请假，趁机至历城与姜叙会面，密谋起兵卤城以反超。裴注所引皇甫谧之《列女传》言此事曰：“会阜妻死，辞超宁归西，因过至历。”据《水经注》，此历城属西县，去仇池一百二十里，后改名建安城。《通典·边防》亦云：“历城今在同谷郡西十里，去仇池九十里。”《读史方輿纪要》明言历城即建安，也即汉之上禄，今之西和。杨阜由冀（今甘谷六峰）至西县，顺便至历（今西和），西地与历必相近。如西位处杨廉川中游，则距历甚远，杨阜难以赴西为名而至历。《宋书·氏胡传》言杨定称蕃于晋孝武帝，“求割天水之西县、武都之上禄为仇池郡，见许”。仇池山在今西和县南部，这是魏晋时期陇南白马氏活动的中心区域。西县与上禄（今西和）一起组合在以仇池为中心的小郡内，其县治不会西北偏至杨廉川流域。《资治通鉴》卷66胡注谓“卤城当在西县、冀县之间”，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断。西县必在卤城之西南，绝不可能在其西北。

前面我们提到两汉之交盘踞西北的隗嚣，《后汉书》本传说他略阳惨败后，“将妻子奔西城，从杨广”，其部将王元率蜀兵将他救出归冀，后被围困，饥病而死。《巩昌府志》却有另外一种说法。该志介绍礼县县城东二里、西汉水北岸的红土山时，说：“上有坪，可容万马。隗嚣战败，携妻子从蟠冢山入铁堂峡，至长道，抵汉阳，栖于此。”《礼县新志》亦如此说。当然，红土山自非西城，然所述隗嚣之败逃路线凿凿，正是西汉水的流经路线，与杨廉川无涉。

综合以上史事分析，我们大致可作出如下几条判断：1. 汉代的西县地境在白龙江以北，与上禄即今西和县接壤；2. 西县故城不在杨廉川经域，而应在西汉水主流经域；3. 西县故城在诸葛亮由祁山向汉中退兵的路线上，因此它只能位于祁山西南方而不能位于祁山东北方；4. 西县故城与汉魏时之历城今之西和城相去不远。有了这四条，我们必然注意《水经注》所提供的关于西县故城的另一种说法：即位处西汉水主流经域的晋代始昌城。依《水经注》的叙述顺序推断，始

昌城位置当在今盐关以东而靠近盐关处。但我怀疑郾氏在这里又有先后次序的失误。因为前述四条推断足以使我们得出结论——西县故城不可能在盐关以东。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诸葛亮建兴六年北伐失利退兵时“拔西县”的问题。所谓“拔”，实乃一种强迫性迁民，为古代战争中常有之举，目的在于削弱敌方实力，增强己方之人口财富。因此必选敌境内最富庶、人烟最稠密的城邑。西县首当其选，其地应较繁盛。在蜀军退兵路线上，何处具此条件呢？《水经注》在叙述西汉水流经祁山之南后，接言：“汉水又西，径南岬、北岬之中，上下有二城相对，左右坟垅低昂，亘山被阜。古谚云：南岬北岬，万有余家。诸葛亮《表》言：祁山去沮县五百里，有民万户。瞩其邱墟，信为殷矣。”熊疏云：“此南岬、北岬，谓南北二壁间之大空也。”这里说的正是东由祁山西至大堡子山的永兴川，当地俗称“店子川”，为今礼县著名的富庶地带。礼县的永兴镇与西和县的长道镇比肩而立，人烟稠密，物产丰饶。而西和河（古建安水）由南而北，即从此小盆地的西端注入西汉水，这也正是由汉中出陇上的军事要道，古称“塞峡”，又曰“鹫峡”。据《宋书·氏胡传》，裴方明征讨杨难当，即出此峡追击。《资治通鉴》晋咸安元年，秦西县侯雅等伐仇池公杨篡，亦兵至此峡。诸葛亮出祁山，即经此建安河谷。《巩昌府志》述西和县曰：“古称用武之国。盖陇蜀之交，武侯从此出师。昔为兵戈抢攘之地。”又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姜维传》，维延熙十六年由石营出兵北上。石营即今西和县之石堡，正位于此建安河畔。我以为，西县故城即处此峡口与祁山之间十余里的地带内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地带西距今礼县县城 30 至 40 里，正是州、县志所言古天嘉之方位。《巩昌府志·古迹》：“天嘉古郡，在礼县东四十里，秦武公所置。”《直隶秦州新志》亦谓礼县“秦置县曰天嘉”，并指出，天嘉县名虽不可考，但“由来称礼县为天嘉，或当别有据耶？”在《礼县山水》卷中又曰：“明礼店文州千户所：县东四十里。秦为天嘉县，元为文州，明初仍之。今有故城。”《礼县新志》亦云：“明礼店文州千户所：县东四十里。秦为天嘉郡，元为礼店文州，明初仍之。今有故城。”曰县曰郡虽有别，但方志均言为秦之建置。余疑天嘉实乃西县故城之别称，可能是后世秦人对其先祖居地的一种纪念性命名。

方志所言古天嘉位置,当在今礼县永兴与祁山之间的某处,甚至最有可能即永兴、长道二镇的前身。至今当地居民称永兴镇为“店子上”,称西汉水此段河谷平原为“店子川”,这显然由于此处元、明时曾设“礼店文州千户所”的缘故。

我还要指出:汉代西县城旁有个姊妹城曰戎丘。《后汉书·隗嚣传》载光武遣大将岑彭、吴汉围嚣于西城,并壅谷水以灌之,情势危迫。嚣之“大将王捷别在戎丘,登城呼汉军曰:‘为隗王城守者,皆必死无二心!愿诸军亟罢,请自杀以明之。’遂自刎颈死。”戎丘的王捷能向围西城的汉军喊话,两城必距离甚近。在戎夏杂居的秦汉时代,盛行这种双城制,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城而居,别而治之。如汉武帝元鼎年间所设天水郡,所属有街泉和略阳道并存,位置同处今秦安县陇城镇一带,汉、氐分治。后来汉、氐杂居日久,风习趋于融合,不复分治,故省街泉而改略阳道为县。西城与戎丘的关系,当如此同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言,非子之后,犬丘地区一度曾被西戎所占,秦仲伐戎败亡。直到庄公时,才在周宣王的支持下打败了西戎,收复了犬丘。此时犬丘城可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,并留居了一些被秦人征服了的戎族残部。故秦人又在其旁另建居邑,即史载宪公即位后所居之“西新邑”。此西新邑发展为秦汉时代之西县城,犬丘故城在其近旁,即后世所说的“戎丘”。先秦陇山以西的戎族,演化为汉以后的诸羌,故多居戎人的戎丘后来称“羌道”。《汉书·百官志》云:“县有蛮夷谓之道。”羌道音变为长道,隋代设长道县。今日之永兴、长道二镇比肩而立,一西一东,同处西汉水之南岸,这正是《水经注》所说的“南岬北岬之中,上下有二城相对”的形势。所以我认为西县故城也即秦人早期都邑西垂,其位置极可能就在永兴、长道一带。

1994年,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在礼县城东约30里、西汉水北岸的大堡子山,发掘了一处西周末至春秋初的古墓群。其中一座中字形大墓,总长87米;一座目字形车马坑,长达110米;另有两座规模也颇大的曲尺形车马坑,表明中字形主墓绝不止一座。该墓群之随葬品几乎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,但专家们从残存物及流传海外展出的器物判断,其为秦先公墓葬无疑。韩伟先生甚至具体推论为秦仲及秦